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唯物史观阐释

——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研究

赵 阵

【内容提要】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中国道路合理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结合这一理论研究能够深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如何建设发展、将会走向何处等问题，从而更好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难题的历史过程，通过解决历史性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唯物史观 跨越“卡夫丁峡谷”

作者简介： 赵阵（1980-），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 410073）。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中国道路合理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结合这一理论研究能够深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如何建设发展、将会走向何处等问题，从而更好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原本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将其转化为抽象的理论分析，以“社会形态理论”断章取义地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阐述。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作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他给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①。为了能够深入分析解答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演变问题，马克思先后撰写了四篇复信稿（其中第四篇为正式复信），在初稿和第三稿中多次提到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一结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现实具体问题所得出的认识成果，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3页。

1.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揭示社会发展是规律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思想，提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①。社会形态的变革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因此，“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②。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社会形态演变的视角和方法，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演变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方式的演变就可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对待具体国家社会发展演变的问题上，马克思一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未否定过社会形态演变的特殊性。比如，他认为战争和入侵就可以使社会形态同化，“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③。再如，交通和商品贸易的发展也会促进个别民族社会形态发生突变，“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④。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在众多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考察基础之上的，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方法和视角，当用它来分析解决具体民族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时，必须结合社会现实方能得出结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深刻阐释了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与具体实现的辩证关系，它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完善。

2. 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社会形态演变理论与民族历史实践的辩证统一

列宁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⑤。目的的一致并不意味着途径的一致，恰恰相反，各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各个民族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必然有各不相同的实现路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规定，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⑦。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探索出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道路或书本理论。

近代以来，中国遭到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殖民，在民族救亡过程中涌现出众多政党组织及社会团体，但是无数次的救亡图存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历史舞台中心，带领全国人民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转变成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经过改革开放的建设发展，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

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358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中国人所走的道路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民族实际所选择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难题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②唯物史观所蕴含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牵引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的基本途径。

1.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进而推动经济基础变革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生产关系则相对灵活，生产关系既可能落后也可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生产力在矛盾运动中的支配性地位，“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社会形态的转换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在先进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中更是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反作用的实现形式。马克思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利用制度优势牵引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建设发展，“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④。

革命运动获得的国家政权成为确保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护卫力量，唯物史观两对基本矛盾中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功能立刻突显出来，社会形态的更替固然需要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但是也还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牵引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既可以通过内部途径自我取代，例如俄国和中国等国的革命；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帮助建立，例如‘二战’时苏联将东欧诸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帮助他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多是通过长期和平竞争，通过创始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来战胜和逐步淘汰资本主义”^⑤。

2.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月革命前夕，考茨基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以“俄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页。

⑤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年第1期。

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未发展到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为借口反对俄国革命。为此，列宁反驳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涵，“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要从‘唯物论’的角度重视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还要从‘辩证法’的角度重视政治活动、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等方面的巨大的‘反作用’”^②。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可发挥引导与规范作用。事实上，每个民族国家国情都大不相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解决其自身的经济社会问题，各国共产党需要在遵循唯物史观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通过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就当下而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体现公有制的本质，要重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揭示出生产力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从而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③ 正是基于这一社会发展理念，中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解决历史性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

道路自信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成功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④ 20世纪末，以苏联为代表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旗易帜”的现象，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本国的建设发展遭受重大挫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建立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仅是第一步，然后是要解决这些民族国家的具体现实问题，一劳永逸式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来就不存在，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东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解决了现实的经济问题，更好地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正确道路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前行的历史过程，只有通过具体实践中不断解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将这一伟大事业深入推进。就当下而言，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通过解决现实难题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力量，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⑥ 正是因为要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所以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页。

② 竭长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与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⑤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年第1期。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时，其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人民的幸福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①。实现跨越的目的在于避免俄国重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老路，从而尽量减少甚至是避免人民群众遭受苦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自然也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应当充分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然而，在私有制社会，由于阶级的分化，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无法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克服了以往社会学说的历史局限，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共产党人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②，共产主义最终要彻底消灭私有制，使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距离共产主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这条道路却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最终必然达到人人都能实现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1.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资本扩张的副产品，它只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永无止境地获取剩余价值，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逻辑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更关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确保丰富的社会产品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产生诸如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本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却是后进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难免出现的问题。习近平在《发展不能走老路》一文中明确指出：“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④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现实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克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带来的社会异化问题至关重要。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助力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活跃，于是有人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质疑。这显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标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成为人们期望实现的理想社会目标，然而由于共产主义距离现实社会差距较大，有些人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所在，从而无法坚定这一远大的理想信念，而远景目标的丧失必然导致脚下道路的迷失。事实上，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而是人类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美好社会建设的逐步积累就必然会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为基础，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迈进。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这一伟大社会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②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从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共产主义，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创造，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③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应着重汲取唯物史观尤其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养分，以丰富道路自信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3]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 [4] 竭长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与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 [5] 冯景源：《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 [6]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编辑：张 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